

# 智能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研究\*

——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例

张亚勇

**[摘要]** 人工智能特别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深刻影响和改变了政党形象建构的主客观环境。人工智能既为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带来了新的机遇，成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党群沟通、优化政党决策、推动政党反腐的有力技术手段；同时又对政党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象认知的真实性、政党决策的公正性、形象塑造的主导权等提出新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应当从改进理念、技术治理、提升素养、遵循规律、健全机制等方面入手，利用人工智能构建中国共产党良好形象。

**[关键词]** 人工智能 政党形象 中国共产党

政党形象是一个政党性质和执政能力的外化，是政党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蓬勃兴起，发展速度和深远影响远远超出人们预期。ChatGPT、文心一言、Sora等深度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快速爆火，加速了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快速推动着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从网络化、数字化向智能化转变。在政治领域，人工智能在深度介入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政党形象建构的主客观环境。智能技术在赋能政党拥有“智慧大脑”的同时，也对政党形象生成逻辑和实践路径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对政党形象建构的影响，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形象风险、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具有重要价值。

## 一、人工智能对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的积极影响

政党形象是由英国学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在研究选民投票心理时衍生出的一个概念，本意是指能够“引起感情反应”<sup>①</sup>并影响选民投票结果的一种“意象”。西方竞争

\* 本文系天津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研究”（TJDJ23-004）的阶段性成果。

① [英] 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5页。

性政党体制，决定了其政党形象建构要以获得选民选票为导向，以影响票决结果为目的，具有重视领袖个体形象、重视媒体包装设计、极不稳定性等特征。与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革命手段取得政权、有着初心和使命的使命型政党。这决定了其政党形象建构要更加关注政党形象对完成使命任务的影响，更加重视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组织特征、精神风貌、执政绩效等实践形象。在新时代，只有“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sup>①</sup>，才能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因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要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目标来进行，为完成党在新时代的目标任务服务。人工智能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形象建构的现实条件和影响因素，可以为中国共产党建构良好形象提供强力技术支持。

### （一）人工智能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新工具

意识形态体现政党的阶级属性，承载政党的宗旨理念和价值追求，是政党形象建构中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建构良好的政党形象，必须牢牢掌握智能化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人工智能有助于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才能筑牢政党形象建构的思想根基。人工智能可快速生成形式多样、贴近受众心理预期的意识形态内容，并根据用户偏好进行个性化推送，大大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有助于执政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人工智能有助于抓牢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一些“非马”“反马”的社会思潮也借机兴风作浪，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构成严重威胁。借助人工智能，政党可以精准预判意识形态风险，加强事前管理，做到防患于未然；可以实时把握意识形态态势，加强事中管控；可以准确知晓公众的想法意见，加强事后总结反馈，有助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

人工智能有助于增强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意识形态话语权“包括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等”<sup>②</sup>。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就必须解决主流意识形态“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sup>③</sup>的窘境。通过运用人工智能增强现实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让主流意识形态宣教从传统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单调方式转变为更加立体、逼真、沉浸式展示方式，有助于破解“讲不好”的问题。运用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将晦涩难懂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让群众易懂、愿听、易记，有助于破解“听不懂”的问题。人工智能通过嵌入新媒体平台，扩大了受众范围和传播广度，有助于破解“传不开”

<sup>①</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2页。

<sup>②</sup> 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sup>③</sup>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86页。

的问题。

## （二）人工智能为加强党群沟通畅通了新渠道

良好的党群沟通能够让政党保持对群众诉求的敏感性，制定出更加符合群众需求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助于在群众中树立起良好形象。人工智能在克服传统党群沟通单向度、渠道少、效率低等弊端，增强党群沟通的时效性、准确性和广泛性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人工智能可以增强党群沟通的时效性。传统的党群沟通模式囿于人工体力和精力的限制，以及层层审批的流程制约，很难对海量的群众诉求作出及时回应，影响到党群之间沟通的时效性。人工智能嵌入党群沟通平台，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等技术，实现对群众意见和问题的快速分析和及时处理，对常规性问题能够及时作出应答，对特殊性问题能够及时筛选分类，并提报到相关负责部门加以解决。人工智能服务还具有并行性及无休性优势，可以通过智能聊天机器人、智能语音助手等智能应用，多渠道与群众进行全天候沟通，实现及时沟通不等待。

人工智能可以提高党群沟通的准确性。党群沟通的准确性主要是指沟通内容的准确性和把握群众需求的准确性。在内容沟通方面，人工智能通过对用户的历史数据分析把握用户偏好，并据此进行个性化沟通和内容推送，增强了沟通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在把握群众需求方面，人工智能借助语义分析技术、数据挖掘技术，实时把握群众思想动态，精确捕获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满足群众多样化差异化诉求提供技术支持。

人工智能可以增加党群沟通的广泛性。党群沟通的广泛性能够使政党的执政方略更具人民性和代表性，有助于在群众中树立起良好形象。其一，人工智能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及生成、图像识别等技术实现了跨文化、跨语种的交流，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的党员群众提供了沟通媒介，促进了多元文化交流，有助于解决跨文化跨语言沟通难题，扩展了党群沟通的广度。其二，人工智能嵌入党群沟通平台，冲破了时间地域限制，实现党群之间随时随地交流，拓展了党群交流的深度。其三，人工智能通过对社交媒体平台言论和情感的全面监测分析，让政党了解更多主渠道之外的呼声和诉求，增加了党群沟通的效度。

## （三）人工智能为优化政党决策创造了新条件

政党绩效是政党形象生成的核心要素。而政党绩效会受到政党决策质量的直接影响。传统政党决策客观上受限于决策信息的庞杂无序，主观上受限于不同决策主体的局限性，有时很难做到高质量决策。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生成和处理功能为决策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机器学习算法的预测分析能力为决策提供直接的支持<sup>①</sup>。

在客观上，人工智能可以提高信息处理效率。其一，人工智能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手段对相关信息进行全面收集处理，将海量数据处理成更有价值、更为关键的核心信息，提高了决策的信息质量，打牢了科学决策的信息基础。其二，人工智能可以依据大数据建

<sup>①</sup> 参见吴进进、符阳：《算法决策：人工智能驱动的公共决策及其风险》，《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立决策模型，通过对大量决策文献及数据的学习训练，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为政党决策提供对策建议和数据分析支持。其三，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政党监测决策效果，自动收集和分析决策实施效果和社会反响，让政党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了解决策实施后的效果和影响，对未达到预期效果的决策及时作出调整和改进，让决策更加符合客观实际。

在主观上，人工智能可以防止和克服决策主体的主观随意性。人在体力、精力、能力等方面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所能掌握的决策信息总是相对有限和片面的，这就导致人在决策时会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认知局限和认知偏见，难以保证决策的公正性。与之相比，人工智能在信息输入、处理、存储、提取等方面的能力更为强大，所提供的信息更加全面客观，大大夯实了科学决策的前提基础。另外，人在立场、利益、性格、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性，容易导致人在决策时被个人情绪所左右，被主观喜好带偏，出现决策偏差和决策失误。而人工智能可以按照算法规则和算法程序进行程序化决策，基本上能够屏蔽掉人的主观情绪和喜好，大大提高了决策的客观性。

#### （四）人工智能为推动政党反腐提供了新手段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sup>①</sup>，也是损害党的形象的最主要因素。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反腐败必须“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sup>②</sup>。人工智能在反腐败预防、教育、惩戒等方面具有更多优势，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提供了新手段。

人工智能提高了监督效果，促使干部“不敢腐”。高效监督能够形成“伸手必被捉”的强大震慑，是促使干部不敢腐的重要保证。其一，人工智能增强了监督的全面性。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建立全天候的监督平台，破解了由于人精力的有限性和注意力的多变性导致的监督盲区，使干部的用权行为时时处处处于监督之下，不敢再以身试法。其二，人工智能增强了监督的精准性。人工智能通过对数据和痕迹的收集研判，可以准确发现腐败分子行为的内在联系，精准判定腐败易发高发的重点人群、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使监督做到重点突出、靶向发力，提高了监督的精准性。其三，人工智能增强了监督的实效性。人工智能可以冲破人情关系的干扰和羁绊，释放出更大的监督威力，无疑会大大提高监督的实效性。

人工智能改进了防腐机制，促使干部“不能腐”。健全的腐败预防机制是干部不能腐的关键所在。其一，运用人工智能机器算法可以建立腐败预防模型，通过模型提前预测出可能滋生腐败的高危人群，并及时对其作出提醒，将腐败行为扼杀在未然状态。其二，运用人工智能可以建立更加高效的数据公开平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杜绝了因权力“暗箱操作”引发的各种腐败行为。其三，运用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审批自动化。“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缺少监督，又缺乏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6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6页。

透明，导致审批公章成为少数官员手中的摇钱树”<sup>①</sup>。人工智能可以自动审核文件和资料，既有利于提升审批效率，又减少了人为主观因素对审批活动的影响，无疑会大大降低腐败行为发生的概率。

人工智能增强了教育实效，促使干部“不想腐”。一方面，人工智能有助于丰富教育内容。在廉政教育内容上，人工智能打通了古与今、中与外的界限，使古今中外的廉政教育典型案例、有效做法、经验教训等融为一体，实现了教育内容的全景式呈现，极大地丰富了廉政教育内容。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有助于改进教育手段。人工智能技术与VR、AR、MR、XR等显示、交互技术融合，打通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使虚拟实境教育成为现实，以更有触动性的教育达到让干部不想腐的目的。

## 二、人工智能对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的现实挑战

人工智能对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的影响是多维度多方面的，既带来了新机遇，同时也在多个层面带来了新的挑战。

### （一）人工智能对主流意识形态带来“认同”挑战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影响着党员的信仰信念以及群众对党的信任信心。脱离了认同的意识形态终将沦为虚假的意识或无力的说教。人工智能能够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对主流意识形态加以解构、排斥和撕裂，客观上增加了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难度。

“智能鸿沟”加剧了对特定人群的排斥。“智能鸿沟”是由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种新型数字鸿沟。一方面，“智能鸿沟”横亘在智能人群和非智能人群之间，让非智能人群游离于智能化生活之外，无法利用智能技术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成为意识形态教育引导过程中的“隐身人”。另一方面，“智能鸿沟”横亘在智能强国与弱国之间，造成智能技术强国可以凭借其技术优势向其他国家进行“信息殖民”和“价值输出”，加剧对他国人民的认知误导、思想扭曲和精神控制，进而在智能技术弱国内引发矛盾和分歧，影响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算法歧视”固化了某些意识形态偏见。人工智能算法歧视是指由于算法模型的构建、训练数据的选择等原因导致的对某些人群或事物的偏见或歧视。“算法表面中立，但可能以自动化决策隐藏深刻的社会偏见”<sup>②</sup>，算法歧视把对意识形态的某些偏见隐匿在“算法黑箱”当中，以带有偏见性的信息传播增加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和抵制。同时，由于这些带有偏见性的意识形态信息被广泛传播，又会被人工智能算法作为信息源引用，从而形成意识形态“偏见循环”，导致某些带有偏见性的意识形态被反复强化。

<sup>①</sup> 张明、唐云锋、肖鹏等：《简政放权：严防“批出来”的腐败》，《财政监督》2015年第1期。

<sup>②</sup> 陈姿含：《司法算法决策中的权力逻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群体极化”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人工智能通过向用户推送其感兴趣的同质化信息，加深了用户原有的偏见和观点，导致了“信息茧房”效应。这样，处于不同类型“信息茧房”的用户因接受信息类型及内容的不同而产生价值取向分化，相同或相似“茧房”内的用户价值取向高度同质化、内聚化，导致群体自我纠偏能力不断丧失及片面认知的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了群体极化现象。不同极化群体不仅观点千差万别，而且很难快速纠正，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增加了认同难度。

“信息泛滥”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人工智能可以无限制地生成海量的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造成信息量的爆炸式增长和用户选择范围的扩大。与严肃的意识形态信息相比，大量的娱乐化、趣味性的信息更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海量的“泛娱乐化”信息会消耗用户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减少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关注和学习，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

## （二）人工智能对政党形象认知带来“真实”挑战

政党形象本质上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观反映，是一种主观认知和总体印象，但这种主观认知又会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容易造成“客观现实”与“主观认知”之间的偏差，甚至迥异。人工智能作为政党形象生成的中介工具，有时会加大客观现实与主观认知之间的反差，影响到对政党形象认知的真实性。

信息推送影响对政党形象的全面认知。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推送算法具备极强的隐匿性及强制性，它隐藏在信息系统后台，以用户无感知的方式反复向其推送感兴趣的信息，减弱和阻断其他信息的推送。在这一过程中，信息选择权几乎完全由算法所主导，用户基本丧失了对信息的主动选择权。当涵盖政党形象的信息部分或全部未命中用户个人心理倾向时，则会被算法部分过滤或全部阻断，限制了政党形象的全面传播，从而影响到对政党形象的全面认知。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依靠智能算法极力屏蔽中国共产党正面信息，大肆宣传其负面信息。他们在限制中国共产党正面形象流量的同时，极力加大负面信息传播权重。长此以往，用户就会对政党形象形成负面印象，影响到对政党形象的全面认知。

信息造假影响对政党形象的正确认知。人工智能算法可以轻松生成大量虚假信息，使信息呈现出真伪难辨态势，影响到对政党形象的正确认知。近年来，ChatGPT、Midjourney 等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使得虚假信息的生成速度及质量有了极大提升，呈现出快速且逼真的特点。特别是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快速图像合成技术，大大提高了信息深度造假水平。“深度造假给当代社会带来的最大危机依然是人们对任何事情的默认的怀疑态度，这将在腐蚀新闻业的可信性的同时，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乃至可能的灾难性后果。”<sup>①</sup>一些敌对势力利用这种深度造假技术，快速生成大量有关政党的负面虚假信息并进行大范围传播，妄图达到混淆黑白、造谣抹黑党的形象的目的。

<sup>①</sup> 姬德强：《深度造假：人工智能时代的视觉政治》，《新闻大学》2020年第7期。

信息误导影响对政党形象的准确认知。一方面,人工智能算法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他们对未知领域也会给出一些自以为是的答案,甚至会胡编乱造,造成对公众的误导。特别是当用户对人工智能非常信赖之时,这种误导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者将某些带有偏见性的政治观念、价值取向植入人工智能算法时,算法便具备了歧视特性,且该特性被“算法黑箱”隐藏起来,从而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对公众认知形成误导。

### (三) 人工智能对政党决策提出“公正”挑战

智能鸿沟可能会弱化民意的代表性。一方面,在民意采集过程中,“智能鸿沟”会把一部分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水平不高的人排除在智能应用之外,使他们不能借助人工智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影响到决策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智能鸿沟拉大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距。强势群体可以凭借技术、资本、人才等方面的智能优势发出更强的声音,表达出更有影响力的意愿诉求,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而弱势群体由于智能劣势,其意愿诉求往往会被智能鸿沟所隔绝,成为在决策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群体。

舆论操控扭曲了政党决策的公正性。人工智能隐匿在公众视野之外,通过“深度造假”和“社交机器人”等手段,对公众进行舆论引导和民意操控,影响到政党决策的公正性。一些西方国家凭借其既有的舆论霸权,借助人工智能进一步加强了舆论操控力度,而公众无力查证这些舆论的真实性,往往被裹挟其中,进一步壮大了舆论声势。政党在进行决策时又不得不考虑社会舆情反映,致使决策公正性被舆情所左右,失去其应有的公正性。

### (四) 人工智能对政党形象建构提出“主导”挑战

在传统政党形象建构过程中,政党可以通过信息把关、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等方式,牢牢把握政党形象建构的主导权。人工智能的出现和普及使政党在形象建构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

人工智能弱化了政党信息“把关人”角色。按照既定的信息标准,通过对信息的筛选、加工、处理实现对信息的把控,是政党维护和塑造自身形象的重要手段。在传统的“形象主体-形象媒介-形象客体”的政党形象单维度构建过程中,政党可以通过媒体把关对报道内容进行精心选择,形成对公众认知的把控和主导。人工智能的应用极大地弱化了政党信息“把关人”角色:一是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高质量的虚假信息,让把关人难以在短期内分辨真伪以及及时进行甄别“把关”。二是人工智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成海量信息,让把关人陷入纷繁混杂的信息海洋而无法“把关”。三是在利益驱使下,一些人工智能平台企业置“真实”“客观”底线于不顾,想尽办法绕过把关人监管,利用智能化手段只向用户推送能够博取用户流量的信息,弱化了政党在信息传播中的主导地位。

人工智能分散了政党“议程设置”主导权。人工智能具有一定的议程设置能力,客观上分散了政党“议程设置”主导权:一是人工智能可通过数据分析和算法模型,准确捕捉用户兴趣点,并据此向他们推送特定类型的信息,引导公众加强对某些议题的关注而忽略其他议题,这就对公众有限的关注资源形成分流。二是人工智能可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和自然语言处理,高仿真地模仿人类行为模式,自动制造和扩散虚假信息,扩大议题争议和引导公众讨论方向,事实上弱化

了政党议题把控能力。三是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情感分析技术，识别和评估公众情感倾向，并根据公众的情感倾向，生成相关内容或回应模式，对公众情感和态度施加影响，导致主流媒体发出的信息得不到应有的关注，这就对政党议程设置主导权构成挑战。

人工智能增加了陷入“塔西佗陷阱”的风险。“塔西佗陷阱”是指“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sup>①</sup>。可见，政党一旦没有了公信力，不仅意味着执政成本的大幅增加，也意味着政党形象的崩塌。人工智能的发展让造假技术越来越高，呈现出“低成本”“难分辨”“易传播”的技术特性。从造假成本上看，ChatGPT、Midjourney等智能应用具备强大的文案、图片、视频处理能力，能够以成本几乎为零的效率生成和传播海量不实信息，对政党公信力构成直接损害。从造假内容上看，人工智能可通过舆情分析挖掘出社会敏感话题和痛点问题，并大肆疯狂炒作，不断挑拨群众的不满情绪，诱使一些极化群体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信息，而不愿意相信任何官方的通报澄清，逐渐陷入“塔西佗陷阱”。从造假效果上看，人工智能合成的人像、视频等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有时甚至专业人士也很难辨别真伪，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当不明真相的群众大量接触到这些足以乱真的虚假信息后，就会逐渐丧失理性思维和自主判断能力，并对党的执政理念、工作绩效等产生质疑，从而对政党公信力构成现实威胁。

人工智能放大了个体事件的“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中，一个细微的变化可能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巨大连锁反应。人工智能引发的蝴蝶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由数据偏见引发的蝴蝶效应。当训练人工智能的数据集存不完整或存在偏见时，人工智能可能会依据这些起始数据产生带有偏见性的结果。这些结果可能进一步影响公众决策和行为，从而产生蝴蝶效应。二是由自我增强能力引发的蝴蝶效应。一旦人工智能在某个特定领域开始成功时，它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导致对该领域的影响不断扩大，进而产生蝴蝶效应。三是由系统相互作用引发的蝴蝶效应。人工智能可以广泛应用于复杂系统（如社交网络、城市规划、金融市场等）的预测或决策，这种预测或决策上的微小变化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特别是发生决策失误时，会对政党形象建构带来更大损害。

### 三、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的实践路径

面对人工智能这一政党形象建构的重要变量，我们既不能因盲目乐观而掉以轻心，也不能因过度恐慌而自乱阵脚。我们要做的是沉着应对，综合施策，从理念、技术、素养、治理、制度等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如此方能趋利避害，始终把握政党形象建构的思想主动和工作主动，使人工智能成为塑造良好政党形象的有力工具。

<sup>①</sup> 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5页。

### （一）改进工作理念，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给政党形象建构带来的巨大影响

理念作为行动的先导，必须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改进。一是树立智能化理念。面对人工智能给政党形象带来的巨大挑战，我们应主动改变对人工智能的某些“傲慢与偏见”，牢固树立智能化理念，自觉适应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趋势，把运用和驾驭人工智能当作一种工作常态、一种工作能力，深刻认识人工智能给政党形象建构带来的“常”与“变”、“危”和“机”。二是树立与时俱进的理念。人工智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对党员来讲，如果不积极学习、不持续更新，很快就会落后于时代，沦为智能时代的“边缘人”。因此，政党必须主动适应人工智能发展潮流，时刻保持对人工智能最新进展的关注，通过持续学习不停地完成“更新升级”，从而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大潮中始终具有强大的智能驾驭能力。三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执政理念。人工智能作为人的有限理性范围内的工具拓展行为，其决策往往优先考虑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工具理性，而无法考虑道德、伦理和情感等价值因素。因此，在借助人工智能构建政党形象之时，就要始终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以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

### （二）强化技术治理，营造良好的人工智能应用生态

坚持正确价值导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化技术治理。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旨归。在人类社会智能化趋势难以逆转的背景下，合理利用人工智能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防止其对人类形成反噬效应，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必须解决好的方向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要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最终目标，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原则，在信息识别、筛选、分类、推送等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领人工智能算法文化正确方向，为形塑中国共产党良好形象创造条件。

加强应用监管，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可持续发展。加强应用监管，可以降低人工智能被恶意使用者利用的风险，有效消除其对政党形象造成的潜在风险。一是加强技术监管。通过加强人工智能技术自主研发和人才队伍培养，持续提升训练数据的全面性、算法价值的无偏性、数据的安全性及系统的可靠性，不断提高发现和修复技术漏洞的能力，为防范和化解技术风险打好基础。二是加强企业监管。加强对研发智能技术和产品企业的监管，引导他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和长期效益，进而不断提高企业的公共属性。三是制定法律规范。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人工智能及其产品使用的规范约束，运用法律手段制止与打击对技术漏洞的恶意利用。

推进智能平权，确保人工智能应用的公平性。“智能平权是减少数据偏见、破解算法歧视、弥合智能鸿沟的关键举措”<sup>①</sup>，是人工智能时代建构政党形象的一项重要工作。推进智能平权，需要从算法平权、用户平权两方面入手。在算法平权方面，要优化人工智能开发团队的人员结

<sup>①</sup> 余杰：《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化解》，《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12期。

构,努力做到学科背景多元化、年龄结构差异化、利益代表多样化。同时,要不断提高算法训练数据的代表性、安全性、正当性,努力做到数据采集更加全面,加密存储更加安全,审核使用更加规范,以训练数据的全面性确保算法的公平性。在用户平权方面,要加强人员培训,尤其是要加强对“智能穷人”的倾斜性重点培训,不断提升他们运用人工智能的能力,确保他们的参与能力与人工智能发展相适应。

开展伦理治理,引导技术向善发展。凭借数据的高效保障与算法的强力驱动,人工智能开始具备脱离人类控制的自主创造能力,在打破人类对创造性工作垄断的同时,也潜藏着技术伦理隐患。将人工智能关进伦理与人文的笼子,既是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政党形象建构的重要条件。在技术层面,要不断提升相关科技人员的技术管控能力,使其能够及时识别各类伦理风险,准确判断风险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做好应对准备。支持研发人员将伦理道德标准编译成代码形式,融入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和应用,确保其发展与公共利益相一致。在道德层面,要通过完善人工智能领域道德伦理规范,引导科研人员树立伦理道德意识,促使他们在研发过程中始终坚守伦理道德红线。组建专业化的伦理委员会,支持他们自觉开展人工智能伦理风险评估、监控监管和实时应对,把道德引导和道德约束贯穿于人工智能设计、研发和应用的全流程之中。在法制层面,要不断完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使人工智能从设计、研发、测试、产业化到应用的全过程都有法可依,不断消除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法律监管盲区 and 空白点。

### (三) 提升智能素养,为政党形象建构提供人才队伍保障

提升党员干部智能素养是构建良好政党形象的关键所在。“人类社会已迈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学习、工作和娱乐方式,人工智能素养将成为新时代公民如同‘读、写、算’一般重要的基本素养。”<sup>①</sup>人工智能素养不只是简单操作人工智能的能力,还包括对人工智能相关理论、技术运用、信息研判等方面的综合掌握和运用能力。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系统培训。系统培训可以帮助党员干部快速掌握人工智能相关知识和技能,是提高党员干部智能素养的重要手段。一是调整充实培训内容。抓紧研究制定智能化能力培养目标体系,把智能素养作为党员干部素质能力建设的刚性内容。将智能素养课程纳入各级党委、培训学院课程体系,将培训情况作为党员干部上岗工作、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二是完善分层分类培训体系。根据党员干部的领导层级、岗位需求等情况,定制差异化的培训方案,分期分批、各有侧重地开展智能素养培训,切实提升受训者的智能素养。三是改进培训方式方法。通过运用互动交流、技术研讨、实验实践、案例分析等多种教育培训手段,并结合最新显示与交互技术,不断提升党员干部驾驭人工智能的能力。

激发干部自主学习动力。在干部个人层面,要主动对接智能化对干部能力素质提出的新要

<sup>①</sup> 楼又嘉、李一航、王永固等:《人工智能基础教育课程全球图谱:开发框架与实施方略——UNESCO〈K-12人工智能课程图谱〉报告解析》,《远程教育杂志》2022年第3期。

求,自觉把提高智能素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不断增强提升智能素养的积极性主动性,实现由“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在学习人工智能上下真功夫,争做智能达人。在组织层面,要把党员干部智能素养状况纳入干部评价考核体系,把智能素养考核与干部年度考核、平时考核有机结合起来,与干部奖惩提拔等实际利益结合起来,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使那些智能素养高的干部能够被发现、被肯定,真正受到褒奖和重用,从而在干部中形成勤学、善学、比学的良好风尚。

着力打造复合型高素质干部人才队伍。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迫切需要一大批既熟悉党务知识,又谙熟人工智能的复合型干部人才队伍。一是要在“选”上下功夫。在人才招聘引进工作中,要有意识地把那些具备人工智能专业背景和发展潜力的优秀毕业生纳入公务员招聘视野,加大高水平人工智能人才的引进力度,畅通社会人才向党政机关流动的渠道。二是要在“育”上做文章。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侧重性地开展好学习培训。对党务干部要重点加强人工智能知识和能力的培训,对智能专业干部要重点加强党务知识培训,实现精准施教、靶向培训,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三是要在“考”上树导向。坚持“看一时”与“重一贯”相结合,对干部智能素养进行科学评估考核,根据考核评估结果对干部进行动态交流调整,最大限度地保证适合的人在适合的岗位上,最优的人在最优的位置上。

#### (四) 把握人工智能规律,借助智能化手段建构良好政党形象

能否以智能化手段建构起良好政党形象,根本上取决于政党对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只有把握并遵循人工智能规律,才能因势利导建构良好政党形象。

优化政党形象建构逻辑。一是着力打造为民亲民形象。执政党要借助机器学习算法对日益增多的、多维度的、差异化的民意进行快速识别梳理,准确获取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痛点问题,及时把握群众的心声呼声,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使政党执政更加合民情、顺民意、得民心,从而夯实政党形象建构的民意基础。二是着力打造高效服务形象。依托人工智能平台加强党务政务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安全共享,实现多部门协同办公,达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目的,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同时,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人性化、广覆盖的智能客服系统,自动高效地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业务咨询等方面的服务。三是着力打造智慧政党形象。在用好现有智能平台的基础上,有计划、分步骤地把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引入党务和政务工作领域,构建起一整套高效运行的应用平台,不断提升工作智能化水平。

遵循智能化形象传播规律。智能化时代的形象传播有其特殊规律,需要在传播实践中加以遵循,让其为政党形象建构服务。一是突出个性化传播。要善于通过人工智能收集分析用户数据,了解用户兴趣、偏好和行为,有针对性地进行个性化传播。二是注重互动化传播。要善于通过智能互动、聊天机器人等方式,与用户进行实时互动,并在互动中吸纳用户的诉求和想法,在不断调整改进中增强传播效果。三是重视情感化传播。要善于通过人工智能把握用户的情感诉求及情绪表达,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将信息以情感化的方式进行传播,从而引发用户深层次的共鸣,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改进形象塑造的方式方法。一是放大积极舆论，巩固正面形象。在供给侧方面，要借助人工智能加强对社交媒体大数据的监测分析，准确把握社情民意，通过定制化内容推送和个性化互动，加大对积极舆情信息的宣传推送力度，引导各类媒体释放出更多的正能量，持续巩固党的正面形象。在需求侧方面，要善于通过情感分析、主题挖掘和关键词过滤等算法，精准把握公众的心理诉求，积极进行正向引导，从而巩固党的积极正面形象。二是消除负面舆论，修复受损形象。在事前防范方面，要利用智能技术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管理和监督，对恶意、虚假信息及时进行过滤屏蔽，最大限度地压缩负面信息传播空间，以维护社交媒体正常秩序。在事中处置方面，要利用人工智能及时捕捉舆情风险点，并对其进行实时处置（例如，对一些恶意账号进行封号处置）。根据舆论走向和公众情绪，利用智能化手段自动生成恰当的应对模式，不断降低负面舆论的关注度，以达到转移舆论焦点、减少其影响力和破坏力的目的。三是借助热点事件，积淀良好形象。热点事件发生后，政党要运用人工智能快速提供透明信息，合理设置议程，为公众提供客观全面的解读，避免公众因受错误的、非理性的信息误导而走向偏激，使良好的政党形象在热点事件处置中不断积淀。

#### （五）健全体制机制，为政党形象建构提供制度保障

健全风险防控机制。一是建立科学的预警防范机制。利用人工智能加强对社交媒体、视频平台的实时监测，准确识别和预测有损政党形象的潜藏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二是建立高效的管控处置机制。一旦损害政党形象的事件发生，要通过人工智能快速给出有效处置方案，并对不同处置方案结果进行推演，力争用最优方案降低事件对政党形象的影响。三是建立完善的闭环管理机制。在妥善处置好事件的同时要深入分析导致风险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基于原因分析，制定完善相应的管控和预防措施，以减少类似风险的再次发生。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得法律的滞后性进一步凸显，人工智能某些领域已走入法律的无人区，对我们传统法律框架及法律理论造成了重大挑战。”<sup>①</sup> 在顶层设计层面，要加强与学术界、行业协会、教育界、社会组织等多个相关方合作，获得多元化的专业知识和视角，保证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的科学性、可行性和适应性。在具体法律法规层面，要进一步明确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管理、监督的相关标准与要求，明令禁止利用人工智能破坏公共服务系统、非法收集个人隐私、发起意识形态攻击、深度造假欺骗等损害政党形象的活动，以确保人工智能的使用符合道德标准、法律规定和公共利益。在制度机制层面，要建立人工智能系统安全评估机制及信用评级制度。定期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安全和风险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给出必要的改进措施，确保系统始终安全可靠。对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或个人违规行为，要采取降低信用评级、责令关停等惩戒措施，确保他们的应用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健全问责追责机制。“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是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首要和关键问题。”<sup>②</sup> 健

① 徐昭曦：《反思与证立：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性审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② 金梦：《中国人工智能立法的科学性探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全问责追责机制，对违规使用人工智能行为进行及时问责追责，是保证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是明确责任主体。虽然输出结果是人工智能做出的，但人工智能开发者决定了算法模型、训练数据、数据安全等条件，他们必须对决策失误及隐私泄露等问题承担相应责任。作为人工智能使用者，虽然他们将一些行为或权力赋予了人工智能，但必须承担安全审查义务和对智能输出结果审慎判断义务。二是明确监管责任。探索建立健全分层分级、层级对应的监管责任制度，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监管联席会议等综合协调机制作用，完善跨部门综合执法，探索建立区域一体化沟通协调和对接合作机制。三是严肃问责追责。对出现严重问题或造成不良后果的组织和个人，要依法依规进行问责追责。如果是技术类问题，则要追究开发者和提供者的责任；如果是决策管理类问题，则要追究相关部门的责任；如果是个人造成的问题，则要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健全评价反馈机制。科学有效的政党形象评价反馈机制，是及时纠偏的有效手段，也是建构政党形象的重要环节。在评价反馈方式上，要利用人工智能与广大用户建立直接的评价反馈途径和双向沟通渠道，实现反馈环节的实时双向互动，不断提高反馈信息的全面性。在评价反馈内容上，要通过人工智能算法精准生成信息发布者及评价者的用户画像，并对信息的有效性进行甄别，保证反馈信息的准确性。在反馈结果运用上，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数据处理优势，实事求是地汇总、梳理、分析评价反馈结果，及时向有关部门反馈评价分析结果，并听取和吸纳各方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确定改进方案，策划下一阶段政党形象建构的目标和任务。

## 结 语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快速发展中的技术工具，正在对政党形象建构的多个要素和环节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能否有效地利用和驾驭人工智能，让其为政党形象建构服务，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的重大命题之一。面对人工智能这种快速发展的、极具颠覆性的技术，我们要积极乐观，相信拥有着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和化解技术风险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必能做到趋利避害，有效防范和化解人工智能带来的形象建构风险。但同时，也应做一些前瞻性思考和系统性谋划，以更加积极、负责任的态度应对人工智能的发展，通过理念、技术、教育、政策和机制等手段来推动人工智能良性发展，让其在政党形象建构中发挥出最大潜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人工智能展现出强大的技术优势和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它不可能完全替代人的作用。建构良好的政党形象，最关键的还是政党自身的努力和实际作为。

（张亚勇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政治学与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瑞 华]